

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演變 ② 課程講義



【96年12月14日擬】

【士當以天下為己任---北宋時期】

一、唐宋之間是否出現歷史上的一大變革？「內藤假說」指何而言？

- 1、唐末五代演變的主要趨勢為何？權力集於何處？--從地方分權到中央集權
- 2、門第是怎樣消融的？社會出現怎樣的變化？---從階級社會到平等社會
- 3、「綠色革命」與「火力革命」各指何而言？---從自然經濟到貨幣經濟
- 4、儒學因何而復興？思想觀念出現怎樣的特色？---從絢爛外鑠到淡雅內省

宋代繪畫展現了事物的內在意義，也表達了藝術家的內心經驗。花卉不是自然的寫生，而是傳達它純潔優雅的屬性，遠山高峰是記錄藝術家內心豁達孤傲的感覺，而晚鳥歸林則描繪出暮暉漸退之際潛存心頭的那股惆悵。（《簡明中國歷史》）

參考閱讀：吉川幸次郎著，鄭清茂譯：《宋詩概說·序章》（聯經）

錢鍾書著：《宋詩選註·序》

繆鉞、葉嘉瑩合著：《靈谿詞說·前言》

二、契丹是怎樣建國的？遼、宋處於怎樣的情況？

- 1、遼何以是第一個「征服王朝」？何謂「征服王朝」？
- 2、「青牛白馬木葉山」是祖先傳說嗎？3、「澶淵之盟」是怎樣締定的？影響為何？

參考讀物：陶晉生，《宋遼關係史研究》

三、何謂士大夫的「自覺精神」？此一精神之意義為何？

- 1、「自覺精神」是怎樣出現的？以范仲淹與胡瑗為例。

所謂「自覺精神」者，正是那輩讀書人漸漸自己從內心深處湧現一種感覺，感覺到他們應該起來擔負著天下的重任。范仲淹為秀才時，便以天下為己任。他提出兩句最有名的口號來，說：「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」這是那時士大夫社會中一種自覺精神之最好榜樣。

在仲淹同時，尚有有名的學者胡瑗，偕孫復兩人，在泰山的一個道院中讀書。

相傳胡瑗接家信，苟有「平安」二字，即投之山澗，不復啟視。如此苦讀十年，終於得到他精神上的自信而去。這都是時代精神的需要下，並不需師承而特達自興的。

胡瑗投書澗畔的十年，和范仲淹僧寺裏「斷齏畫粥」的日常生活，無疑是在他們內心深處，同樣存著一種深厚偉大的活動與變化。他們一個是北宋政治上的模範宰相，一個是北宋公私學校裏的模範教師。北宋的學術和政治，終於在此起了絕大的波瀾。（錢穆：《國史大綱》）

北宋四子：周敦頤、程顥、程頤、張載。

張載字子厚，……先生少孤，自立，志氣不群，喜談兵。年十八，慨然以功名自許，欲結客取洮西之地。上書謁范文正公（仲淹）。公知其遠器，責之曰：「儒者自有名教可樂，何事於兵。」手《中庸》一卷，授焉。遂翻然志於道。已求諸釋考，乃反求之六經。嘉祐初至京師，見二程子。二程於先生為外兄弟之子，卑行也。先生與語道學之要，饜服之。因煥然曰：「吾道自足，何事旁求。」於是盡棄異學。淳如也。當是時，先生已擁皋比，講易京師。聽從者甚眾。先生謂之曰：「今見二程至。深明易道。吾不及也。可往師之，即日輟講。」（《宋元學案·橫渠學案》）

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。

2、何謂「慶曆改革」？何以未能成功？

慶曆改革的失敗，考其原因，大約有三：一是多數官僚在行政上予以反對阻礙；二是改革派本身也有缺點；三是遭受政治中的陰謀破壞。……改革派的缺點，可分四項來說：第一是議論多而實際的條件未具備；第二是個人的性格和作風也有影響；第三是他們樹黨樹敵的毛病；第四是其中人物往往好標奇立異。（劉子健，《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》）

參考閱讀：劉子健：《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》之「從政」部分。

四、「熙寧變法」指何而言？影響為何？

1、王安石是一位怎樣的人物？宋神宗何以重用他？

一日講席，群臣退，帝留安石坐，曰：「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。」因言：「唐太宗必得魏徵，劉備必得諸葛亮，然後可以有為，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。」安石曰：「陛下誠能為堯、舜，則必有皋、夔、稷、契；誠能為高宗，則必有傳說。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。何足道哉！以天下之大，人民之眾，百年承平，學者不為不多。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，以陛下擇術未明，推誠未至，雖有皋、夔、稷、契、傳說之賢，亦將為小人所蔽，卷懷而去爾。」帝曰：「何世無小人，雖堯、舜之時，不能無四凶。」安石曰：「惟能辨四凶而誅之，比其所以為堯、舜者也。若使四凶肆其讒慝，則皋、夔、稷、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？」（《宋史·王安石傳》）

何處難忘酒，君臣會合時。深堂拱堯舜，密席坐皋夔。和風襲萬物，歡聲連四夷。此時無一杯，真負鹿鳴詩。(王安石詩)

- 2、變法的主要內容為何？制置三司條例司、青苗法、免役法、保甲、保馬法等。神宗極聰明，於天下事無不通曉，真不世出之主，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。如王介甫（安石），亦是不世出之資，只緣得學術不正，遂誤天下。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，那裏得來！此亦氣數使然。天地生此人，便有所偏了。可惜！何惜！（《朱子語類》卷 127）
- 3、變法的結果如何？何以如此？
- 4、變法失敗是造成北宋覆亡的主要因素嗎？

從改制而用幹才，用幹才而造成弄權的機會，王安石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。南宋史家，念亡國餘痛，認為新法誤國，也有其理由。不過，舊黨以德治為重，既不能改善行政，裨益國計民生。又不能以道德轉換和領導因循型的多數官僚，眼看他們依附弄權的蔡京，又何嘗不負相當的責任？新舊兩黨各有不同的儒家理想，卻都沒能成功。北宋晚期政治的失敗，也可以說是北宋各種儒學，經世致用，在政治上始終沒找到出路。這也是南宋學，一轉而高談理性的原因之一。（劉子健，〈王安石、曾布與北宋晚期官僚的類型〉）